

## 乙未之際的臺灣天主教—以傳教員張德潤為中心

古偉瀛\*

### 摘要

戰爭對宗教傳播有很大的衝擊，除了直接的傷亡，更因為戰爭性質所引起的恐懼及仇恨，加深了流言的效果及後遺症的持續延燒，例如國際因素使得民族主義的情緒強化衝突，使得更大的破壞及掠奪找到合理的藉口，也可能使原來的裂痕加深，需要許多時間及努力才能回復平靜。本文即想說明乙未割台之後臺灣天主教的遭遇及受到的衝擊，尤其是以傳聞中頗多矛盾的傳教員張德潤為中心，探討研究傳教史的困難所在，釐清史實，並補上一些空白。戰爭看來像是宗教傳播的良機，事實上卻往往造成人員及財物的損失，不利於追求和平的宗教。

**關鍵詞：**臺灣天主教、張德潤、阿論先、中日戰爭、何安慈、員林、斗六、道明會、傳教員、反日軍

---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乙未之際的臺灣天主教－以傳教員張德潤為中心

古偉瀛

- 一、問題與史料
- 二、乙未之際的天主教
- 三、阿潤先
- 四、阿論先
- 五、夾在烽火中的基督徒
- 六、結束語

---

### 一、問題與史料

臺灣天主教史上最大的史實問題之一，是馬關條約後日本領台前後教會扮演的角色。由於事涉敏感的民族主義問題，迄今許多史實無法確定。本文要談的就是教史上記載，當時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位傳教員，一般通稱為”A-lun-sian”或是” Celedonio lun-sien”。<sup>1</sup>

迄今為止，相關的教會史書上說A-Lun-Sien是陳沛然，然而其他的檔案，包括一些日本史料卻記載著一位名叫張德潤的傳教員。到底此人是張還是陳，lun字代表是「潤」還是「論」？一直沒有定論。他在日軍入臺以及日本治臺的初期到底有那些作為？對此人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看到研究臺灣天主教史的困難，也更可以見到戰爭對教會造成的衝擊及連帶的影響。

本文所使用的史料要感謝許多人士。首先是提供西班牙文檔案的山樂曼博

---

<sup>1</sup> 西班牙文檔案中第一次提到張德潤時，稱他為 “Celedonio Lun-Sien”，Celedonio為聖名，此後對其名字的拼法前後不完全一致，或拼為“Lun-Sien”，或拼為 “Lun-Sen”。見山樂曼神父提供的資料：(Relación vida del P.Giner en 1912).

士(Migul Sanroman, O.P.)，他提供一些應該是在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三〇年代都在臺灣傳教的高熙能(又名高恒德，Francisco Giner, 1863-1946)神父的資料，以及鮑曉鷗(Jose Matteo)教授的協助將西班牙文譯成英文；另外，李文良教授提供《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的張德潤所親撰的〈願書〉自述其一生的傳記資料、日軍在中部戰爭資料，以及助理蔡嵐婷的協助整理及日文翻譯。

## 二、乙未之際的天主教

乙未割台之際，日軍在一八九五年六月三日率領一萬二千軍隊首先在澳底登陸，直逼臺北。當時在臺北城的外商及本地的商人組成的團體，向逼進臺北城的日軍表示和平進城的心願，以及臺北的情況，其細節已多為人所知，且非本文主題。當時西人的記載如下：「我們快到距臺北10英里的水返腳時，最初看到日本人。」<sup>2</sup>水返腳即今汐止一帶。

在天主教方面，資料顯示當時在臺北的神父是何安慈(Celedonio Arranz, 1853-1922)，他是一八八六年後北來重新開教的道明會神父，他先是在和尚洲(約在今臺北縣蘆洲)落腳，等站穩後，前來臺北城，在當時洋商最多的大稻埕附近租屋傳教。一八九五年時，何神父正在生病，似乎是嚴重的中暑及疝氣，<sup>3</sup>使其寸步難行。

此外，年輕的林茂德神父(Nemesio Fernandez, 1866-1895)，曾於一八九〇年在彰化傳過教，因為一八九二年干預員林教友張鳳私宰耕牛，與道理廳書館火災等案件，與彰化知縣羅東之發生衝突，最後知縣遭到撤職，林茂德神父則以屢次干預地方公事為由，一八九三年調離彰化，一八九五年遣返廈門。一

---

<sup>2</sup> James W. Davidson著，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台北：臺灣銀行，1972)，頁214。

<sup>3</sup>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史：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Pablo Fernandez,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translated by Felix B. Bautista and Lourdes-Bautista,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1959) (台北：光啟出版社，1991)，頁145。

八九二年的案件中，傳教員張德潤曾以火災目擊證人身分到堂作證，根據《教務教案檔》記載：「據張德潤供稱，住彰化員林街三條圳，七月初九夜三更後，道理廳被火焚燬……火焚後縣主到地履勘，潤亦前去眼看。」<sup>4</sup>可見此時張德潤已活躍參與地方教務，為天主教盡心盡力。

一八九五年林茂德神父聽聞日軍來臺，認為此時是一個機會，又從大陸返抵臺北，一方面協助正在患病的何神父，另一方面卻是對日本在臺灣的未來充滿信心。雖然，他抵達臺北後，很快就得了霍亂而去世，然而，在黎克勉教區長神父(Isidoro Clemente, 1853-1915)一八九五年九月的教務報告中，摘錄了林茂德神父在去世前一天寫的信：

我能在這兒住多久呢？我是為協助何安慈神父而來的，他的病情相當嚴重，寸步難行。他會終生半身不遂嗎？現在有一位日本人在照顧神父。

日本軍隊緩慢地向南部進攻，遭遇到很激烈的抵抗，使得日本人對老百姓監視很嚴厲，怕他們協助義民。如果日軍攻下彰化，情況大概會有所變化。有許多日本人來聖堂拜訪我們。他們會寫漢字，所以可以用筆談互相溝通。昨天有一名皇家衛士來訪，他是教友，聖名若望。我們成了朋友，希望有機會和他談談中南部教友們的處境。

如果可能的話，我會和他一起去中南部。<sup>5</sup>

何安慈神父也在一八九五年九月從淡水寄出的信中感嘆惋惜：

林神父對於淡水的一切都很滿意，他原希望在日軍佔領後，有一番作為。他有信心在幾個月內學會日文，和日本當局建立友好關係，這樣可以幫助我們推展傳教工作。他雄心萬丈，計劃不少，然而死神的來臨，使他的構想頓時化為烏有，多麼可惜呀！他還不到三十歲呢！<sup>6</sup>

何神父在兵臨城下之際，派遣從中部彰化北上之傳教員張德潤(lun-sien)前去，與日本軍隊商議，由於張氏並不是知名人物，因而未曾出現在其他紀錄

<sup>4</sup> 《教務教案檔》第2128，收入古偉瀛編，《臺灣天主教史料彙編》(台北：臺大出版社，2008)，頁122-123。

<sup>5</sup>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史：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頁142。

<sup>6</sup>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史：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頁145。

上。他自稱：

潤於去年三月三十日，早已先避，乘時住到臺北大稻埕教會堂，及到廈門，往反有兩三月之際，遇見臺北清國官欽差唐景崧，串通臺北地方透至臺南地方，一概清國官僚改易臺灣，變名曰民主國，……時唐景崧懼怕，逃回內地去矣。以後大稻埕街，清國銀庫，被清國軍兵發火自焚，各兵自相搶奪時，日本軍隊在錫口，未有舉行，在大稻埕一概人民，不敢向日本軍隊引路，故潤奉西班牙國教士命令，往到錫口，向引日本軍隊來大稻埕安民。越至數日，潤回歸本鄉，仍然教讀。<sup>7</sup>

此與美國記者Davison所寫的情況差不多，當然每個人寫這一段時多少都會誇大自己在這次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一般而言，日本官方認定前往基隆遞請願書，帶水返腳軍隊進入臺北的士紳代表辜顯榮功勞最著，日後敘勳層級也最高。<sup>8</sup>

日軍隨後也向中部挺進。何神父不久離開臺北到廈門養病，並與其他五位在中南部受到反日軍攻擊而逃難的五名教友於九月返回臺北。<sup>9</sup>

日軍南下北斗時，經過員林（林仔街），想找一些工人為他們搬運軍火，而恰好我們的傳教員潤先正在該處，他就被任命為那些工人的領班。潤先是很虔誠的教徒，但也有些不好的性質（有點愚昧）。<sup>10</sup>

潤先使所有的工人的衣服上都有一個十字架的標記，暗示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他以為這樣是做了一個好的傳教工作。當這些看來像是宗教徒的工人到達北斗時，軍隊停在該鎮，但有一隊約有兩百士兵前往斗六，八月20日抵達。日軍進入斗六時未遭任何抵抗。反日軍眼見日軍來到，立即撤退時並沒有抗拒。

<sup>7</sup> 張德潤，〈願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221，文號7，《敘勳》，〈林振芳外二名〔張德潤、呂汝玉〕及番文杰外三名敘勳ノ儀稟申並黃成章以下十三名勳章及附屬品送付ニ依リ傳達ノ件（總理大臣外數ヶ所）〉，附件，張德潤願書，頁1b-2a（願書以漢文撰寫全文共4頁，每頁分為ab兩面）。

<sup>8</sup> 參考谷ヶ城秀吉編，《辜顯榮翁傳》（東京：ゆまに書房，2008，據1931年臺灣日日新報社本重印），頁12-13。其中提到辜顯榮在明治28(1895)年6月5日前往基隆，頁14-21詳載《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完整過程。頁117載1895年12月敘勳六等單光旭日章。

<sup>9</sup>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史：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頁144。

<sup>10</sup> 這也是山樂曼神父提供的一份資料。

日人認為前路障礙已除，繼續前往大莆林。反日軍察知日軍僅有二百人，便想捉住他們。日軍則在泥濘中移動，不過日軍的武器優勢，使得臺軍撤退，日軍傷亡也不少，日人抵抗，並發覺自己過份深入敵軍陣營，原來之前雨下得很大，北斗與斗六間的河流暴漲而無法過河。軍隊無法繼續前行，只能從大莆林返回斗六，找不到同志的增援，因而退到雲林的北斗，日本大軍紮寨之區。<sup>11</sup>

反日軍看到日軍行動，以為是怯戰逃走，將日人趕出了斗六，自以為是城市的主人。同時，在斗六由潤先所領導的工人傳出一些不實的誇大流言，說有一隊基督徒軍，衣服上有十字架圖案，由林茂德擔任隊長（他們不曉得林茂德已在一個月前病逝於臺北），也有人說高（熙能）神父是領袖，因為他已失蹤多日，不在斗六出現，很可能已投靠日本人。<sup>12</sup>反日軍利用這些謠言以便報復前幾年的仇恨，並決定清除基督徒。

九月三日晚，一群教民在斗六教堂中秘密地誦唸玫瑰經時聽聞台軍在搜尋他們，並有意殺掉他們，這促使教民逃離到其他的兩個村鎮。他們剛走，就有入侵者就劫掠教堂，並火燒傳教士住宅，之後他們又到鄰鄉沙崙仔，他里霧及樹仔腳的小教堂搶掠。過了數週，日軍抵達臺南府，該城的傳教員被殺，或許是因為某個中國的會黨成員要殺他，因為聽說他向日本舉發了一些他們黨中人士。

十一月底日人成功地平定了各地的抵抗，但基督徒卻並不知道日本當局對他們的政策，不敢返回自己的家鄉。幸好高熙能神父的安撫，教民終於返家，高神父說服教民日人不會傷害他們，並且會保護他們，讓他們過宗教生活。高神父知道如果教民仍舊躲躲藏藏，將無法維持其信仰，而傳教工作將回到原點。

據西班牙檔案記載，在一八九五年前後早有一些長老教徒在斗六，其領袖與天主教會關係增進，人們期待他成為天主教徒，並協助傳教。但有一位〔天

<sup>11</sup> 有關日軍在臺灣中部的進出及戰鬥是綜合山樂曼博士提供的西班牙文資料，並由鮑曉鷗教授譯成英文。

<sup>12</sup>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台北：杉田書店，1941），頁332；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高雄：善導週刊社，1992），頁205。

主教友〕名為潤先(員林的傳教員，性格較大而化之)，對於與天主教走得很近的長老教徒很強硬。潤先羞辱這位新教徒，並向其挑釁有關教義的問題。後來此新教徒就離開了，未再回到天主教的道理廳。此人姓賴(Lok)，一九二三年時住在我們斗六的教堂附近。當日本人到達時，爆發動盪而我們的教堂被毀。這位賴某利用此機會，而長老會信徒則再度揚眉吐氣。<sup>13</sup>

### 三、阿潤先

前面提到過西班牙檔案中的「潤先」，這位傳教員應該就是在日本公文類纂中的張德潤，<sup>14</sup>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所存公文書中，可以見到張德潤有一份履歷書提到自己的身世以及在日本入台之際的作為，這就是所謂的張德潤〈願書〉。他說年輕時看不慣清廷的官吏，本想當和尚，但因緣際會成了天主教的傳教員：

……而潤自二十歲之時，在本莊開設小學校教讀。有兩年間，潤觀審世勢，風俗敗壞，彼清國所出貪官汙吏，各處頭人，皆是不正。有錢者生，無錢者死，故潤舍去教讀，思從彼沙門，即是去髮為作和尚。時行到羅厝莊，入天主教會堂內，看見天主經文，處處有規有矩，皆益善於人也。於是潤始從西班牙教士習成經文規矩，在羅厝莊教會堂，管〔館〕內傳教。<sup>15</sup>

兩年後到了臺北在大稻埕傳教四年才返回員林，繼續教書傳教。直到一八九五年農曆三月，有傳言日本要入臺統治，燕霧下堡過溝莊賴萬青向彰化清朝

<sup>13</sup> 山樂曼神父提供的資料：(Relación vida del P.Giner en 1912).

<sup>14</sup> 最早將張德潤生平整理出來的是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年~1905年》(台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137：「張德潤，員林，36歲。天主教佈教師、塾師。乙未4月因西班牙幫戰日本之傳聞而受襲，乃逃大稻埕並內渡廈門。數月後歸大稻埕，往錫口迎軍以來大稻埕安民。後歸員林，隨軍往南收籍於北斗臺南間。雲匪亂，自募人伙200餘人專責彈藥運搬，後幫戰於南投草鞋墩埔里、北斗林杞埔集集間。後同街總理。家屋受匪燒失數回。1897.12.15。八〔等〕瑞〔寶章〕。」

<sup>15</sup> 張德潤，〈願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221，文號7，《敘勳》，頁1a。

官員指控天主教西班牙教士與日本政府聯合侵台，派兵搜捕教堂，他及時逃走，來往於臺北及廈門間，後來奉西班牙教士之命，引領日人入臺北大稻埕。<sup>16</sup>之後數日，就又返回員林繼續教讀。

日人佔領臺北後，賴氏仍與其弟在員林向百姓徵稅抗日，直到日軍前來才退居山中，而張德潤與當地一些社會精英協助日本在當地的統治，安定秩序，「家家戶戶，立旗寫字，歸服日本帝國」。<sup>17</sup>

日軍來到後，張氏自敘其活動，經整理列表如下：<sup>18</sup>

1895/07- 1895/10	34	日軍入彰化，張德潤前往引導，集苦力買辦米糧，接應日軍。中途往臺北照會教士十餘日，後又回員林。再度召集苦力，往來北斗—員林—雲林—彰化—臺中—嘉義—臺南，後回至員林。(在北斗時聽聞斗六和沙崙仔教友受襲，欲往見教士，乃回員林)
1895/10- 1896/01	35	送司令長官沖野精義回臺北，回北斗召集苦力往埔裡社七、八回。
1896/02-05	35	於員林開設義塾教讀
1896/05/19 -1896/08	35	雲林、南投土匪。召集苦力80名，往來雲林—南投—北斗—彰化—臺中之間，有時幫戰。
1896/11/13 -1896/12	35	召集苦力，至雲林縣、嘉義縣搬糧24天
1897/01	36	接獲彰化支廳長電信，速順途往鹿港從諭，回歸本宅，書寫履歷
1897/02-12	36	敘勳，8等瑞寶章(公文類纂，永久保存)

<sup>16</sup> 同上，頁1b-2a

<sup>17</sup> 同上註。

<sup>18</sup> 同上，2b-4a。

在《臺灣日日新報》當中，也記載了一段關於張德潤的小插曲。一八九七年（明治30）年六月十九日，日本憲兵隊攻入一賭場，與在屋內民眾發生戰鬥，擊斃劉回等4人。七月十日，有化名為「員林街不平則鳴子」投書《臺灣日日新報》稱劉回等人並非惡匪，係遭「員林街地棍」三人，「魏文歸」、「謝先仔」、「張得論」讒言陷害，以致枉送四命。<sup>19</sup>過了兩星期，在七月二十四日，報上刊出被指為惡徒的三人之共同聲明，說該次行動「係憲兵守備明知之事，不干魏文圭、張德潤、謝先仔等之事」，<sup>20</sup>認為是遭人匿名誣陷，希望查個水落石出。除了三人署名登報澄清之外，七月二十七日，相關人士還以「員林街公明正大鏡」為筆名投稿辯駁，文中說：「張德潤、魏文圭之二人同為先導已，其他不敢關也。謝先仔是惠來庄之總理，曾與員林街所不相識。」<sup>21</sup>最後在八月四日刊登，七月二十八日發信之臺中通信中說道，三人還透過燕霧下堡局長代理人，向前來巡視的臺中縣知事村上義雄陳情，說「自己只是履行官命，卻遭此無實之冤」，最後以知事加以慰問安撫而告終。<sup>22</sup>報紙前後記事都未提及張德潤身為天主教友或曾獲頒勳章等事，但從張德潤〈願書〉看來，張德潤與魏文圭在一八九五年就已熟識，而臺中縣知事也早在當年的二月三日就發過為張德潤敘勳的公文。<sup>23</sup>

西班牙傳教士的記載，除了此文前面所提到的事蹟外，有下列的補充：

他是臺灣中部林仔街的人氏，很少人像他那樣多年來虔誠熱心又是很認真的工人……對於傳教士頗為忠心（這在中國人當中頗為難得），因此在他的名下買了好幾筆土地。在北部建造房子時，由他在管理，他也是一位傳

<sup>19</sup> 《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7月10日，三版，漢文，〈四命含冤〉。本文所引用《臺灣日日新報》，其報紙影像檔案，皆取自漢珍數位圖書公司之「漢珍YUMANI版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http://smdb.infolinker.com.tw/>（2009/10/15）

<sup>20</sup> 《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7月24日，五版，漢文，〈為除惡安良被孽徒捏誣貽惑民心弄擾紀律之訴由〉。

<sup>21</sup> 《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7月27日，一版，漢文，員林街公明正大鏡〈讀四命含冤之記事〉。

<sup>22</sup> 《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8月4日，二版，日文，〈臺中通信（七月廿八日發）〉。

<sup>23</sup> 張德潤，〈願書〉，頁2b、3a；〈林振芳外二名〔張德潤、呂汝玉〕及番文杰外三名敘勳ノ儀稟申並黃成章以下十三名勳章及附屬品送付ニ依リ傳達ノ件（總理大臣外數ヶ所）〉，民內第200號，內縣祕第9號。

教員。他個性很強，有時不太小心，強烈批評基督徒及慕道者。他經常帶著玫瑰唸珠在唸經，不以為恥。他也將最近花了1500匹索修繕完畢的房子捐給教會。在日人到達中部時，發現他是難得的好幫手，因為他熟悉地形，活動力強，而且頗為可靠。他為日本提供了很好的服務，因而得到了瑞寶章，是給華人的最高榮譽，並且有年金每月十元。他若將日人給他的錢及華人中得到錢累積起來會相當富有，但他沒有野心，過著相當簡樸的生活……。

我在1899年五月初得到他最後的訊息。他的葬禮很風光，有很多日人現身，儀式在林仔街市場舉行。<sup>24</sup>

#### 四、阿論先

在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一書中提到一位傳教員阿論先的事蹟，<sup>25</sup>文中還有一小標題：「傳教員：論先（陳論先生—阿論先）」。此人似乎就是前述的張德潤，但是姓氏名稱卻是不同，值得進一步探討。

江氏書一開始就討論此名稱的由來：「阿論先（即阿論先生，原文寫為Lun-Sien，姓陳。日人聽台語發音譯韻為『沛然—Lun-Jen』。臺灣甚多傳教手冊，皆襲用日人之翻譯以「沛然」沿用）。」<sup>26</sup>事實上，大國督的書中是寫成「セレドニオ陳沛然傳道師」，然而在「陳沛然」三個字的旁邊注有：「（チンルンゼン）」<sup>27</sup>此處很顯然，此傳教員的聖名是Celedonio，但他的中文姓名，應該是由當時的臺灣監牧楊多默(Tomas de la Hoz, 1876-1949)口述，而由大國督依其發音而寫出，比較可靠的應該是其音譯，由於楊氏為西班牙人，大國督為日

<sup>24</sup> 以上均為山樂曼神父提供的資料。

<sup>25</sup> 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頁151-153。

<sup>26</sup> 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頁152；頁140也有類似字句說：「Lun-sien即阿論先生，本島人稱先生之簡稱為「先」；至於該傳教員之姓名，日人韻譯近日韻為陳沛然『Lun-Jen』。」

<sup>27</sup>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頁266。

人，所加上去的漢字姓名，大有疑問。<sup>28</sup>由於西班牙文獻中多記為Celedonio Lun-sien，通常西班牙傳教士在敘述或報導時，只提到聖名及名字，很少提到姓氏，因而造成許多研究上識別的困難。本人以為由於大國督之書乃經口述轉抄，很可能將漢名弄錯，可以較確定的是一般所稱的「阿論先」，其聖名Celedonio，其中文名字中有一lun'字，此字可以是「論」，也可以是「潤」。就連《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投書，也曾依發音將其名寫成「張得論」。<sup>29</sup>

江氏的陳沛然生平大多採譯自大國督的書，偶而加上一些個人的回憶，下文引用其傳，將大國督原書所無之處，加以底線標出：

論先（阿論先生）出生於林仔街（NA-A-KE，今之彰化縣員林鎮）。他成年後始得公教信仰，在員林最先領洗入教，其後他常在愛德內生活，故頗受街民之敬慕。他進教後，最初傾全力在員林街輔助何安慈神父(Rev. Celedonio Arranz, O.P.)教化臺灣中部之居民。然後，何神父奉調臺灣北部（和尚洲、臺北、興化店、小基隆等地）從事傳教之際，他亦跟隨神父去和尚洲、臺北、興化店及小基隆竭力傳教。特別於臺北大稻埕興建臨時聖堂及神父宿舍時，他一方面忙於傳教，一方面以熱誠，親自監督工事，與匠工相處無間，而達成預期之目標完竣工程。

他為人慈善，甚憐憫無依無靠之老寡婦。他曾以自費計劃創立養老院。可是因種種困難發生，終於無法實現。但他為此耗資一千五百圓所建築，屬於他自己之房屋，原封不動奉獻給教會充為教堂之用。尤其是求道者到他之家庭學習道理，或者教友與求道者至聖堂守主日時，他經常以飯菜招待午餐（他之家就在聖堂附近，又他之家庭經濟環境可能不錯），宛如辦喜事請客之盛況。他信德非常堅強，不論何時何處，雖在眾人面前，他總不

<sup>28</sup> 事實上最早出現陳沛然三個字是在《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的第250頁，1887年3月陪同何神父北上和尚洲，但當時並未有日文片假名的注音。至於傳教員的漢字姓名問題，大國督此書頁261、263亦將傳教員「吳先」寫為「吳前」；頁260將嚴超的拼音「ギヤン」寫成「β向陌」（「β向」合為一字），其實大國督書中傳教員ビセン・ギアン(Vicente Gan)與頁260、268提到的傳教員ビセント・チャオ(Vicente Chiao)應是同一人。

<sup>29</sup> 《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7月10日，三版，漢文，〈四命含冤〉。

畏懼或躊躇，常常當眾祈禱。

又阿論先為人豪爽善於交際，語言有相當造就，當日軍政府來到員林街頭時，被徵召為通譯，協助當地治安，頗受日軍政府所器重。因其有功，日政府頒賜給他瑞寶勳章，並賜其年金。

據聞：當時日軍政府為防範不法之徒，造冊調查良民時，曾詢問他何人屬流氓，他僅說一句「好人」，日軍便不再追究。故他為了地方民眾，做了不少好事，不然當時之街民不知有多少人，可能被日軍監視，甚至惹出更多麻煩或損〔殞〕命。

如是，阿論先不但在救靈方面，且為地方益處而貢獻良多，然而他日常生活甚克己，心甘情願薄衣粗食。他稍有積蓄，便將金錢或食物援助貧困者。他目睹受援者之歡喜面容，自己覺得無上快樂與安慰。

阿論先乃罕見之高人品者，他身為一個教友，又是傳教員，盡瘁於公益工作，其人格與功績為人所欽慕。他於公元1899年五月中，不幸染病於故鄉員林，在百花競艷之季節，魂歸天鄉。據聞他年輕時生有一子，但不幸夭折，因之無後裔。<sup>30</sup>

\*筆者之祖母，於員林開教當初，即離今八十年前，跟阿論先學道理，然後領洗入教。筆者童年時稱呼阿論先之夫人為「先生媽」（媽即祖母）。據祖母說：阿論先客認筆者之父為義子。

然而在稍後的一九一三年，阿論先又出現在江氏的書中：

又於1913年，馬神父派傳教員論先（阿論先生）到二林大排沙傳教，並在該地蓋小聖堂及神父傳教員之宿舍。<sup>31</sup>

另一處寫得更仔細：

公元1913年，馬神父派傳教員論先（陳論先生）至東勢、大排沙佈教。因傳教員論先之熱心與品德，為民眾所賞識，故頗受居民之信任與尊敬，因

<sup>30</sup> 據張德潤〈願書〉「娶妻吳氏，有產下一男一女，俱是早亡。」（〈願書〉，頁1a）

<sup>31</sup> 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頁189。

此他傳教成績斐然可觀。尤其是引導北斗郡二林庄大洲沙之名望家林氏(大國督書作「邱氏」)<sup>32</sup>研究道理而入教，此乃他之殊勳。<sup>33</sup>

但大國督在此段文字中只提到陳傳教員，並未指明是阿論先。<sup>34</sup>

另外，大國督書中還有一處提到陳沛然：

明治三十年在現在的員林街郊外建立了臨時教堂、神父宿舍、傳道所，積極的努力傳教。當時的信眾比任何人都還熱心，有著堅定的信仰。他們的英雄傳教師陳沛然氏其實是在這個教區出生的，最初的教友。<sup>35</sup>

## 五、夾在烽火中的基督徒

戰爭中百姓常常無辜受到波及，因而生命財產受到損失，相當不幸，但作為基督徒尤其不幸，因為他們的信徒身份，常遭到交戰兩邊人士的懷疑，人心惶惶，風聲鶴唳之際，再加上謠言的推波助瀾，使得基督徒腹背受敵，裡外不是人，而遭到更大的傷害。甲午之戰，清朝戰敗，臺灣割讓，但臺人不願受日本統治，起兵反抗。外國傳教士對於新興的日本很有期待，希望能擺脫清廷官員腐敗的統治，至少能擺脫民教間的糾紛，但另一方面，又得隨時提防並抵抗臺灣反日軍隊的仇視及報復。早在十年之前中法戰爭時，北部就爆發過一陣的反教潮，當時北部的基督教堂被毀壞劫掠一空，後來賠償了一萬元。這次日軍來臺，對於一些覬覦外人財物，想趁火打劫的人而言，又是一個可以假借保家衛國，抵抗外侮的美名，搶奪財物，挾怨報復，滿足私慾的大好機會。基督徒面臨此嚴峻情況，自顧不暇，遑論傳教了。

<sup>32</sup>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頁319。

<sup>33</sup> 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頁197。

<sup>34</sup>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頁319。

<sup>35</sup>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頁317。

在何安慈北上傳教時派遣的傳教員，除了張德潤以外，另有一位名為張歷山(Catequista Urbano Tiu-Like-San)，他曾為何安慈神父北上傳教先行探路，<sup>36</sup>協助何安慈神父在和尚洲租屋，《教務教案檔》載清朝地方官為禁止傳教前往教堂勘查時，何安慈外出，張歷山在堂內與官員應對。<sup>37</sup>一八九五年日軍抵台後，在前面已經提到的九月三日斗六教會遭攻擊之事件中，張歷山為疏散教友，來不及逃難，在生命即將受到威脅時，靈機一動跳入井中逃過一劫，然而「他所親愛，正在甜甜入睡之三歲幼兒，卻被毒刃所殘殺，而且屍體被扔在附近之池塘中」。<sup>38</sup>此外他里霧、沙崙仔等地的教堂也都遭到破壞。

戰亂時期，新教徒也難以擺脫相同的命運，在臺南的長老教會巴克禮牧師(Thomas Barclay, 1849-1935)受到臺南士紳的請託，與領日本軍南下的乃木希典大將交涉，引導日軍進城，<sup>39</sup>但在此之前數日，麻豆的新教徒因不肯加入抗日軍隊，被指控「密通日軍」，約有20人遭到殺害。<sup>40</sup>巴克禮甚至擔心若由他帶請願書轉交日軍，「恐怕同樣的屠殺會發生在各地方」。<sup>41</sup>

在日本主政時，有一段和平時期，令人驚訝的是，在動亂中許多被劫的物品都物歸原主。不過這並非什麼良心發現或是一種後悔，而是由於擔心一旦那些遭到劫掠的傳教士或基督徒發現加害者時，會向日本投訴而遭到懲處。

即使如此，日人仍然發動全面調查，要找回被盜之物品。此調查行動由傳教士所引起，但卻有了後遺症，因為傳教士不知道許多當時的盜賊後來在日本法庭找到了翻譯者的工作，在審判之時，這些譯員扭曲証詞，並無恥地誹謗基

<sup>36</sup>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頁250寫為「リ・エキ」(rieki)傳教員，江傳德書頁139認為是「李傳教員」；根據日文讀音，有可能是「歷」的「レキ」(reki)的發音，亦即張歷山；從《教務教案檔》中提及租屋傳教員為張歷山亦可看出。

<sup>37</sup> 《教務教案檔》，第2122，見古偉瀛，《臺灣天主教史料彙編》，頁83-85。

<sup>38</sup> 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頁206。

<sup>39</sup> 參考井川直衛編，邱信典譯，《巴克禮的心靈世界》(台北：雅歌出版社，1997)，頁89-92；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著，林弘宣、許雅琦、陳珮馨譯，《福爾摩莎素描》(台北：前衛出版社，2006)，頁242-243、251。

<sup>40</sup> 編者不詳，《臺灣史料稿本》(台北：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1919)，冊5，頁456-469。(明治28年10月14日)。

<sup>41</sup> 井川直衛編，邱信典譯，《巴克禮的心靈世界》，頁93。

督徒。

他們指控基督徒煽動在地人反抗日人，他們甚至將十一位犯人的逃脫怪罪於基督徒。日本當局聽信了這種指控，結果是五位基督徒及慕道者被囚禁，其中三位被斬首。這件事發生於一八九六年五月。<sup>42</sup>

七月初，爆發了另一波抗日起事，反日軍成功地逐退三百名駐在斗六的日軍。一旦日人離開後，這些反日軍就將怒氣發洩在基督徒身上。斗六教會及神父居所再度被劫，並被放火，夷為平地。幸運的是高熙能神父逃過一劫，因為他人不在斗六。

由於教堂損失慘重，教會於明治三十年(1897)十二月九日由西班牙駐公使向日本殖民當局要求補償明治二十八、二十九年間的兩次暴動損失。其中包括日軍佔領教堂前，當地民眾攻擊中部各教會的部分，以及日軍佔領教堂後，對於教堂的損害部分，例如1896年「傳教士們在斗六新築房舍，成為日本陸軍屯駐所，以其為根據地射擊暴徒」。於是西班牙公使列舉他里霧損失250圓、石龜溪損失130圓、斗六教會損失700圓，山崙仔教會損失1600圓，再加上各地被竊現金、器物，被燒燬之圖書，消失的食品，以及教友寄放在教堂的各種金銀飾品與家具，共計求償九千圓。之所以向日本政府請求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六年被暴徒攻擊的賠償金，西班牙方面的理由是：

概因清國的暴徒之所以將傳教士的教堂屋舍及建築物燒毀，顯然全因為掩護、藏匿等援助日本人的行為。在臺灣的天主傳教士是以文明及博愛為目標，於是將清國人導向尊重並服從日本主權的方向，以合於日本國的要求。因此，保護傳教士是值得的。<sup>43</sup>

然而日本政府並不承認教堂的破壞是日軍所為，也對於西班牙所稱援助日本人的說法全未表示意見，將一切損害的責任推給攻擊教堂的暴徒，堅稱自己

---

<sup>42</sup> 以上取材於臺灣道明會網站：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http://www.catholic.org.tw/dominicanfamily/taiwan\\_history\\_english.htm](http://www.catholic.org.tw/dominicanfamily/taiwan_history_english.htm) (2010/12)

<sup>43</sup>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26卷之十一（明治三十年），民外五七號，臺乙第243號，譯西班牙公使信，頁2a。

的軍隊來到教堂時，已無西班牙公使所列各項物品：

明治二十八年七月中我軍南進守備斗六街時，匪賊來襲之際，南進軍只好暫時退到北斗地方。匪賊跳梁跋扈，劫奪財物，燒毀民家，極度殘暴。當時傳教士高神父屬於受到住民厭惡之輩，再加上土賊當中，有許多人平常因為高神父而吃了很多苦頭，為了一吐某些被冤枉的不滿，土賊們對教堂進行破壞，並非軍隊或內地人（日本人）所為。後來，高神父在同樣的地方沿街再建教會堂繼續布教事業。明治二十九年六月中，土賊又再次襲擊斗六街，這時斗六街守備兵到達嘉義地方時，發現高神父行蹤不明，教會堂已經全變成了空屋（至今仍在）。明治二十九年七月中，討伐軍進駐斗六街時，因為教會堂已是空屋，僅僅將該教會堂充為軍用十天，更無在該教會堂射擊暴徒等細節。而且當討伐軍以教會堂充當營舍之際，早已無任何食物或器具，可能早就被匪賊等掠奪一空，或是全數毀棄了。<sup>44</sup>

雖然日方否認曾在教會堂與暴徒交戰，但經調查證明日軍確曾將教會堂做為軍用之實。於是日本政府決定拒絕西班牙公使的賠償要求，認為「戰時或內亂之際，政府是否應為軍隊或叛徒的損害負賠償責任，公法上自有定論」，況且英、德等國也同樣在這次戰爭中受到損失，而且「本島各地區有許多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的教會堂（北部有六十餘座）這些教會堂所受到的損害與天主教會堂不相上下」，認為並無賠償的必要。僅同意一八九六年時使用教堂的部分，「是否能請求租金」，必須「依規定辦理」。<sup>45</sup>

一直要到五年後，臺灣內部的動盪才受到日本人有效的壓制，平靜下來，反日軍無力再戰，道明會傳教士才再度能夠自由到各地去熱心傳教。

<sup>44</sup>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民字35號外第三九號（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八日嘉義縣知事小倉近信覆，頁1a-2a。

<sup>45</sup>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民外第35號之二（明治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決定，拒絕西班牙傳教士及教會堂的損害賠償提案，頁2。

## 六、結束語

中日甲午戰後，清廷戰敗，訂立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政權轉移過程中，發生動亂。在臺灣的天主教會當時是以西班牙道明會的傳教士十多位在華主持，管理約四五千人，十來個教堂。這些傳教士對於日本的統治是抱有期待的，因而在臺北協助引進大稻埕，在雲嘉地區支援後勤補給，由於協助日軍的工人穿有十字架標誌的衣服，導致抗日軍的反感，趁機攻擊斗六、他里霧、沙崙仔等地教堂，傳教員受到波及，至少一位傳教員之子及臺南傳教員在日軍在中南部作戰時被殺，教堂被毀，堂中許多傢俱物件書籍聖物及錢財損失甚大。至於善後的處理，也因為日軍拒絕理賠，以及挾怨報復的情形，<sup>46</sup>教會中西國傳教士雖未被難，但有些中國教徒遭難，財物損失也很多。

在日本領臺前後，扮演教會與日本中介角色的重要人物是 **Celedonio Lun-sien**。綜合前述的資料判斷，這位人士應該就是張德潤，天主教領洗聖名叫 **Celedonio**，長年在員林街擔任傳教員，教讀並協助神父，與當地賴姓地方領袖有嫌隙，被其向清廷官員告發與日本有勾結，一度避居他地，曾到臺北，為何安慈神父與日軍聯絡引兵至大稻埕安民，後又返員林，協助日人僱工運送戰爭物資，並欲藉將工人衣上佩有十字架標誌而展現宗教力量及其與日人的關係，在日軍進攻雲嘉之際，出力甚多，得到日本授勳之榮，但仍傳出在員林當地與他人發生糾紛，一八九九年因病去世。

至於大國督及江傳德所提及的陳沛然(阿論先，或稱陳論)，雖然事蹟與張氏的〈願書〉及西班牙資料中傳教士所記，大部分相同，但江氏書中在一九一三年仍提到陳沛然，稱之為阿論先，不過大國督的日文書上卻只寫到陳傳教員，並未指明是陳沛然。因此最可能的情況是陳沛然或叫陳論，是另有其人，

---

<sup>46</sup> 除了前文提到的林茂德神父在員林引發的民教糾紛，張德潤與當地賴姓新教徒的對抗，在雲嘉傳教的高熙能神父如前引文之中，可看出也有一些民怨，參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檔案，民字第35號，外第39號（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八日，小倉近信覆。

也很可能是員林的另一位傳教員，被當時主講口述的，西班牙楊多默監牧主教將張德潤與陳沛然搞混了，而經大國督誤記於日文書上，再經江傳德轉譯後，將自己家族的信教歷史及傳聞與陳沛然聯結在一起，因而有前述江氏之祖母向阿論先學習教會道理之事。張德潤確實死於一八九九年，西國資料及大國督之書都記有得到瑞寶勳章之人死於該年。而以後繼續出現的阿論先，則應該是陳沛然，或陳論。日後若有新出土的史料或許能釐清此事。由於歷史變遷使得許多事情及人物都不易得到較確定的評價，民族主義更是很容易激起情緒反應，因此張德潤的事蹟就逐漸扭曲、錯置或淹滅了，這是國與國的戰爭尤其容易造成如此的情況。

戰爭有時看來是一個宗教傳播的良機，但不論是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或是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都証明了在動亂之際，不利於追求仁愛與和平的宗教。

## 參考書目

- Relación vida del P.Giner en 1912. (西班牙文資料，由山樂曼神父提供)。
-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日文資料，李文良教授提供)。
- 編者不詳，《臺灣史料稿本》，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1919。
- 大國督，《臺灣カトリック小史》，臺北：杉田書店，1941。
- James W. Davidson著，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北：臺灣銀行，1972。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教務教案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 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史：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Pablo Fernandez,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translated by Felix B. Bautista and Lourdes-Bautista,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1959.)，臺北：光啟出版社，1991。
- 江傳德，《天主教在臺灣》，高雄：善導週刊社，1992。
- 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年~1905年》，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 井川直衛編，邱信典譯，《巴克禮的心靈世界》，臺北：雅歌出版社，1997。
- 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著，林弘宣、許雅琦、陳珮馨譯，《福爾摩莎素描》，臺北：前衛出版社，2006。
- 古偉瀛編，《臺灣天主教史料彙編》，臺北：臺大出版社，2008。
- 臺灣道明會網站：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http://www.catholic.org.tw/dominicanfamily/taiwan\\_history\\_english.htm](http://www.catholic.org.tw/dominicanfamily/taiwan_history_english.htm)
- 漢珍數位圖書公司之「漢珍YUMANI版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  
<http://smdb.infolinker.com.tw/>

## The Catholic Church of Taiwan in 1895— the case of Catechist Zhang Derun

Ku, Wei-Ying\*

### Abstract

Wars have been detrimental to the spread of religions.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direct casualties inflicted by the wars, but also the horror and hatred induced by the wars which in turn reinforces the circulation of rumors and post-war complications. For example, the international involvement during the war provoked the emotional reaction of nationalism and thus provided the excuse for more violence and damages. It would also aggravate the previous conflict and crack of various kind and take long time to restore original peace and harmony. This article is to narrate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Catholics in Taiwan during the 1895 Sino-Japanese War-aftermath. Special attention goes to the legendary and mysterious catechist Zhang Derun. The difficulties of doing research in missionary history in Taiwan are discussed and some historical vacuum is filled in this article. On the surface, wars seemed to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evangelization. But in fact it always caused many loss of life and properties, and consequently, disadvantageous to the religion which pursues peace.

**Keywords:**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Zhang Derun, A-Lun-sien, Sino-Japanese War, Celedonio Arranz, Yuanlin, Douliu, Dominicans, Catechist, Anti-Japanese Forces.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